

明清学术转换的桥梁与清初学术主流：论清初新理学

□ 王 坚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由于明清学术的多重面向,明清学术转向是经、史、子、集等各种知识门类的整体性转向,既非线性进化,更非狭隘的从宋明理学转向清代考据学或理学、考据学、“尊德行”、“道问学”等某个领域的变化。其中,理学虽然遇到危机,却并非无药可救,兼容并包的“清初新理学”应运而生,成为清初学术主流和明清学术转换的桥梁、清学各派的源头。换言之,明清学术转向不是传统所认为的从理学到考据学的“一步到位”,而是分为“两步走”:在明清之际社会危机中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初新理学”,再从“清初新理学”中蜕变出清代理学、考据学、桐城派等清学各派。反映在政治上,“清初新理学”对清初政治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推进满人汉化与明清学术转向,缓解清初学术危机:“清初新理学”的影响

作为从两宋衍至当今的儒学形态,理学历经千年而非仅仅局限在宋明,按照理学在宋明、清代、近现代所面临的不同任务及由此不断发生的转向,理学至少可以分为“宋明形态”、“清代形态”和近现代形态。虽然三者有深刻内在联系和前后相承关系,却也表现出迥异的学术旨趣:“宋明形态”属于理学生长期,重思辨,重形而上理论建设,重“理”;“清代形态”属于理学成熟期,重实践,重践履,重下学而上达,重“理”“礼”合一;近现代形态属于理学与现代社会的调试、融合期,注重与西方各种思想,特别是唯心主义体系的融合会通。理学各个形态之间的转换并非一蹴而就,就清初来说,则是在理学从“宋明形态”到“清代形态”的关键点上,为应对困境,理学兼容并包,“清初新理学”应运而生。

“清初新理学”群体是一个声势浩大、连接南北、朝野呼应、相互欣赏扶持的群体,其影响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在社会影响上,着力于对清初满人统治者不断汉化,推动“满汉一体”、“崇儒尊道”等一系列缓和满汉矛盾的制度设计成型;第二,

在学术格局上,“清初新理学”是明清学术转换的桥梁和清初学术主流、清学各派的源头。

清代满汉关系近十几年来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正如学者们注意到的,清代满汉关系的变化,包含着“满人汉化”和“汉人满化”两大过程。在清军入关前,虽然满人汉化已经开始,但程度相当有限,处于主流的却是“汉人满化”,后金及清政府把掳掠来的汉人、蒙古人等其他民众编入八旗,到皇太极时代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汉军就是“汉人满化”的集中体现。

满人汉化的第一个高潮是在顺、康两朝,“清初新理学”为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和学术支持。正是由于“清初新理学”着力于满人汉化,“理学名臣”辈出,不但使得“满人汉化”成为此后满汉关系的主流,而且促使清政府在“首崇满洲”同时,形成了与之并行的“满汉一体”、“崇儒尊道”等缓和满汉矛盾的制度设计。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儒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有清一朝尊孔集历代之大成。二是保证儒生通过科举制等上升渠道,汉官数量上不低于明朝,在数量上成为清代官员主体。

由“清初新理学”作为思想动力和学术动力的“满汉一体”、“崇儒尊道”等制度设计,不但使清初高位运行的民族矛盾趋向缓和,反过来又推动满人在制度和文化上更深层汉化。

“清初新理学”汉化满人方面的成效,在与元初蒙古人汉化的对比中,显得更加清晰。同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帝国,元朝在统一中国后治理水平远低于清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元朝蒙古掌权者与汉族势力初步合作受挫后抵制汉化。元初虽然亦有遗民高卧不出,但很多儒生却选择对蒙古统治集团妥协,与之合作,元朝蒙古统治集团汉化比较顺利,他们较早注意保护儒学,推动程朱理学上升为官学,与之相应,儒生们也是竭力回应:“修端在金朝灭亡八个月后提出辽、金亦可为正统和尊蒙尊金的观点。郝经则与许衡一唱一和,从道统、君统等理论

实践结合的层面推出‘今日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的新认识，使这种华夷正统观念逐步演进升华，影响越来越大，它既敦促忽必烈为首的元朝统治者比较积极地吸收汉法，又鼓励广大汉族士大夫打消顾虑，勇敢地参与进入元朝各级政权，因而逐渐成为元王朝官方和士大夫都能接受的正统观念，无形之中成了忽必烈所建元王朝的政治文化纲领，并构建起了以蒙古贵族为核心、联合汉族士大夫的统治体制。”但不久因为李璫叛乱，蒙古统治集团转而重用西藏喇嘛和色目人。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委托帝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同年七月，又下令立诸路蒙古字学，专门教授蒙古新字。在此情况下，元代儒士处境低下就成为不争事实，“九儒十丐”并非空穴来风。

在很长时间，学界有一种“落后民族武力征服先进民族，但最终会被先进民族的先进文化所征服”的观念，其实，先进民族用文化同化落后民族并非无条件的，元朝汉族同化蒙古人就是一个失败的标本。与元初蒙古人汉化一样，清初满人汉化也是一波三折。先是四大臣辅政、鳌拜专权时抵制汉化，而后三藩之乱，“民心动摇，未知所归”，甘肃、江西等地民众重新蓄发易服，清朝统治者对之表示忧虑，康熙帝颇受打击，猜忌汉臣，但也只是采取整理旗务、提倡“骑射”等措施延缓汉化潮流，并没有像元朝那样逆转，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清初新理学”在学理上的强大支撑。

在学术格局上，一方面，作为明清学术转向的桥梁、清初学术主流，包括考据学派、清代理学等清学各派皆从“清初新理学”分流而来，所以，清代考据学派尊顾炎武、黄宗羲，清代北学以孙奇逢为开山，关学奉李颀为宗主，桐城派开山方苞虽“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但仍盛称孙奇逢为“北方真儒死而不朽者”，并为之立传及修订年谱。即使到晚清民初中国学术掀起大规模的现代化浪潮，第一波仍然要先回归“清初新理学”，以对之的扬弃开启对古代中国学术的现代性新诠。另一方面，“清初新理学”各派兼容并包，不似后来各派基于不同目的取其一端，而泾渭分明。

二、时代主题、地域学术格局变迁与“清初新理学”的两种景象

总的来看，基于时代主题、地域学术格局的变迁，清初和晚清以来主流学界对“清初新理学”建构出两种景象，集中表现就是在对“清初新理学”领军的塑造上，在清初，学界以孙奇逢、黄宗羲、李颀“三大儒”作为领军，20世纪主流学界则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作为清初“三大家”。张岱年说：“清初时最有名望的三个大儒是：孙奇逢、黄宗羲、李颀，到了

清末，人们讲清初三大家，就改成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在清朝，由于理学在意识形态中处于核心地位，孙奇逢、黄宗羲、李颀分别为清初北学、南学和关学的领军，他们以学派的力量主导清初学界，其后学延绵不绝。17世纪，魏象枢曾致信李颀说“平生深慕而不获一晤者”的三人是孙奇逢、黄宗羲和李颀，“虽未亲面请教，然而往来有问答，著述有传布，一字一句，都可取之以为典型”。18世纪，全祖望在为李颀撰写的《二曲先生窆石文》谓：“当时北方则孙先生夏峰，南方则黄先生梨洲，西方则先生，时论以为三大儒”。直到晚清，孙奇逢和李颀仍被视为一代学术宗师。比如在河南，当时的理学大师倭仁、李棠阶皆为孙奇逢后学。咸、同年间，方宗诚曾经遍游河南，与河南学术界进行了广泛交往，所见“中州学者，大抵守孙夏峰遗绪”。河南各地名儒如毛昶熙、李又哲、王兰广、于锦堂、蒋榛、田致淑等都是李棠阶的弟子，他们几乎都是通过李棠阶而传夏峰之学，如于锦堂年少时“为人笃实，治陆王之学”，而“后谒河朔李文园太常，得孙夏峰汤潜庵之遗教焉”。就河北来看，曾国藩甫任直隶总督后，就认为以孙奇逢等为代表，以文武兼收、侠儒并用为特征的河北士风犹存，“即今日士林，亦多刚而不摇，质而好义，犹有豪侠之遗”。就关中来看，《关学续编》认为李颀是清代关学中兴的领军，“盖关中道学之传，自前明冯少墟先生后，寥寥绝响，先生起自孤寒，特振宗风。然论者以为少墟尚处其易，而先生则倍出其难”。

到晚清，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之一，在中西、新旧、古今之争的认识框架下，流行于清朝的理学日渐不受重视，到20世纪，忽视、否定理学，从思想上认为其反动、为“封建糟粕”逐渐成为学界共识。章太炎在《清儒》中，独赞考据学派，首先否定清代理学，“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梁启超则发挥说“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不需等到清朝，早在晚明，阳明学“极盛而敝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反封建”不断深入，理学更是人人喊打，当时新派学人所要打倒的“孔家店”，其核心内容就是理学。其间虽有新儒家为之辩解，但否定理学成为20世纪学界主流看法，清代理学更被视为宋明理学余绪，一并被扫地出门。

与反理学相伴随的，则是对清初学术版图的重构。就“清初新理学”来说，其极端表现就是领军从清朝主流学界认为的清初“三大儒”，一变而为20世纪主流学界认可的清初“三大家”。

就顾炎武来说，之所以被推为“清学第一人”，其根基在于考据学派及由此发展而来的“新汉学”

的推崇。在清朝初年,顾炎武虽在知识界有重要影响,但地位只能与归庄(1613—1673)并称“归奇顾怪”,随着考据学派兴起,顾炎武地位不断被抬高,大约到嘉、道之间,随着《国史儒林传》成书,在官方功令、政治忌讳和学术思想本身的综合作用中,顾炎武为清朝第一儒者的论断开始出现,但认同者有限。到晚清民国,随着考据学派空前壮大,先是晚清古文经学领军章炳麟慕顾炎武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顾炎武原名顾绛),号“太炎”,与今文经学领军康有为展开经今古文之争,其后《清代学术概论》一锤定音,顾炎武地位成为共识。

就黄宗羲来说,他自清初以来始终享有盛名,但各期原因却是不同:在清代,他是明朝遗老、戴山学派传人;近代以来,则受到浙东学派、江南考据学派的推崇;在排满革命时,因为《明夷待访录》,他又一度被誉为“中国之卢梭”;进入民国后,学术史大兴,《明儒学案》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学案体体裁,而黄宗羲本人则被认为是上继刘宗周,下开万斯同、全祖望、邵廷采、章学诚,是浙东史学派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在现代学者眼中,《明夷待访录》又被认为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杰出代表。

王夫之被偶像化,更多是近现代湖南士人崛起后重塑地域“文化偶像”的产物,因为承载了过多振兴湖湘之学的功能,故最富有戏剧性。与明清江浙学术影响全国不同,湖南学术默默无闻,从咸、同年间开始,随着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士人集团崛起,湖湘文化才逐步引人注目。为建构地域文化,王夫之作为可资利用的地方先贤和学术偶像,受到近现代湘人极大关注与推崇。早在晚清,鉴于其著作散落,影响有限的状况,以曾国藩、邓显鹤、欧阳兆熊、彭玉麟为代表的湖湘士人,广泛搜集王夫之遗稿,同时抹黑其他学者,为王夫之抬身价,比如彭玉麟在1885年请改建船山书院,就把王夫之与孙奇逢、黄宗羲、李颀、顾炎武相比较,批评后四人称“皆肥遁自甘,为辞微辟,然荐绅多从之游,著述亦行于世,名称稍彰”,褒扬王夫之为“之匿韬声,不欲身隐而文著,故世亦鲜知之者”。同时,湖湘士人还积极启动王夫之从祀孔庙计划,由于努力无果,便更加广泛地收集王夫之手稿,同治初年汇刊《船山遗书》,合经、史、子、集四部,共58种,另附《校勘记》,光绪十三年(1887)又在湖南船山书院补刻6种,1908年王夫之得以入祀孔庙后,湖湘知识分子更是力图把王夫之思想推向全国。民国初年,湖南出现了一批以刘人熙为代表,以保存国粹、弘扬国学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他们创办船山学社,发行《船山学报》,在湖南教育文化界产生相当影响。1921年9月,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在船山学社基础上兴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开

学,原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对于这段塑造王夫之的历史,岳麓书社主持新版《船山全书》编者也并不讳言。

根据笔者所见,把顾、黄、王三者由分到合进而并称,是江浙和湖湘两大知识群体为了提请三人从祀孔庙以光大本地域学术的诉求联合运作的结果。之所以必须把三者并提,一方面,是像孙奇逢、汤斌、张伯行、王建常等清代北方学派的“偶像”已经从祀孔庙。在清朝从祀孔庙的清儒有:陆陇其(1724)、汤斌(1823)、孙奇逢(1828)、张履祥(1871)、陆世仪(1875)、王建常(1875)、张伯行(1875)、顾炎武(1908)、黄宗羲(1908)、王夫之(1908)。另一方面,也在于仅仅单个报请顾、黄、王三者任何一人都难以通过,不得已只好把三人合在一起以增加影响力。正是由于这种策略上的成功,在江浙和湖湘儒生的联合声援下,三人才得以顺利从祀,但鉴于从祀孔庙与否的决定权取决于清政府,所以从提议到最终从祀历时50年,三者排序也由先前联合奏请的王、黄、顾由清政府一锤定音更改为顾、黄、王。

如果更深入地分析,则可以看到,这种清初学术版图及领军重构的背后,所反映的是清朝以来地域学术格局上的巨大变迁。在清初,由于明清大变局首先是从北方爆发,由北向南逐步推进,所以清初学术格局中,北方新理学异军突起,一度引领潮流,反映在领军人物上就是清初三大学士,北方儒者居其二。自晚清以来,与社会变迁相同步,学术格局亦发生重大变革:自乾嘉时期始,两湖、广东地域知识人开始崛起,近代以来,与原有就相当兴盛的江浙地区遥相呼应,形成了以江浙地区为中心和以广州—长沙—武汉为一线的两大“人才带”。这两大人才带建构地域文化和相关学派的强烈意识,深深隐藏在近代中国历史书写的背后。在此过程中,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作为可资利用的学术偶像和地域先贤,倍受近代江浙、湖湘知识人关注,这些知识人依据时代主题对顾、黄、王等相关思想遗产不断阐释,深刻影响了近现代学术之建构,进而不断参与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再生产。清初“三大家”之说,植根于时代主题和地域学术格局,是上述历史与现实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尽管近现代以来,徐世昌《清儒学案》把孙奇逢等列入清初学术开山,学界还出现了“明末四大儒”、“明末四先生”、“清初四大儒”、“清初五大师”(晚清民国学界有“明末四大儒”、“明末四先生”、“清初四大儒”之说,指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及颜元或黄宗羲、李颀、王夫之、颜元,也有“清初五大师”说,指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朱之瑜、颜元)等种种提法,但却都无法撼动清初三大家”之说的地位。

■ 《文史哲》2017年第6期,约23000字